

壹、緒論

教育領導 (educational leadership) 是領導學 (leadership) 的次學科，也是教育研究的熱門焦點。近年來領導學發展常受到其他學科理論的影響頗深，如受量子理論影響，興起量子領導 (quantum leadership) 理念 (Morrison, 2002)，受心理學對情緒智慧 (emotional intelligence, EI) 研究，發展情緒智慧領導 (emotionally intelligent leadership) (Feldman, 1999)、結合生態學理念產出領導生態學 (ecology of leadership) (Senge, 1996)，神經科學研究引導提出神經領導 (neuro leadership) (馬慶國, 2012; Ringleb & Rock, 2008)，這些都擴展了領導學的研究範疇，但是少見教育領導的研究者討論。另外，不少論者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應用至中國情境，產生的本土化 (indigenization) 課題很早被重視 (杜祖貽, 1993)，引發領導研究本土化呼籲 (黃敏萍, 2003)，也產生華人領導理論 (鄭伯壘, 2005)，教育領導方面亦有類似主張 (林明地, 2009)。

再者，隨著研究資料累積越趨龐大，可了解研究文獻及成果發展的資訊計量學 (Informetrics) (蔡明月, 2004)、知識計量學 (Knowmetrics) (侯海燕、陳超美、劉則淵、王賢文和陳悅, 2010)、社會網路分析 (social network analysis, SNA)、知識圖譜 (knowledge mapping)，已用於宏觀檢視領導研究成果 (Balkundi & Kilduff, 2006; Edgar & Cox, 2010)，指出異於過去著重領導相關變項關係驗證、領導實務處理規劃、分析方法和技術應用、領導理論和理念推介等教育領導研究的作法，顯示教育領導研究的觀念和方法可以突破。再者，教育領導研究難免得測量，以分析資料隱含的結構和意義，目前已有處理資訊不充分、資訊不明確等性質的資料分析理論，如模糊集 (fuzzy set)、灰系統 (gray system)、粗糙集 (rough set)、粒計算等，亦有分析大量資料的資料探勘 (data mining)、空間資料探勘 (spatial data mining, SDM) 等理論和技術提出 (陳燕, 2011)，並見應用於領導行為研究 (Matsumura & Sasaki, 2008)。據此可見資料分析理論和技術的發展已經影響領導研究，但對教育領導研究的影響則尚少見。

台灣地區因為高等教育普及化，造成學術研究人口急增，因此教育領導研究應該榮景可期，產出多元的研究成果，可是粗略檢視採取量化研究取向的碩、博士論文探討主題卻以變項關係分析居多，主要進行相關和迴歸分析，次之運用結構方程模式 (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, SEM)、階層線性模式 (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, HLM)、後設分析 (meta-analysis)，其他分析方法則極少見，基於統計方法有其哲學思考、立論假設和適用分析條件 (謝宇, 2012)，故